

教宗本篤十六世
于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發表致中國天主教徒信
(Nota Esplicativa) - (Versione Tradizionale)

藉著聖神降臨瞻禮正式簽署的《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這封信，教宗本篤十六世希望充分展示他對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團體的厚愛與關懷。毫無疑問，教宗是以伯多祿的繼承人、普世教會牧者的身份來這樣做的。

文中突出揭示了兩大基本思想——一方面，是對在中國的公教團體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是對教會學領域中的偉大公教傳統價值觀的執著忠誠。為此，是對愛德、對真理的執著。教宗談到了梵二大公會議以及公教傳統中主要的教會學方針。但同時，還充分考慮到了中國地方教會生活的特殊方面，並在廣闊的神學視野中為之定位。

A - 近五十年來的中國教會

近五十年來，中國公教團體經歷了極其曲折的歲月，走過了艱難而痛苦的歷程。不僅在中國天主教會的歷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還構成了其持續至今的特殊特徵。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天主教會團體遭遇了第一次迫害。許多外籍主教和傳教士遭到驅逐、幾乎所有中國教會人士和各平信徒運動團體負責人均被捕入獄、聖堂遭到關閉、教友被隔離起來。五十年代末，成立了國家宗教局和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等國家機構組織。其宗旨是，領導和“控制”各種宗教活動。一九五八年，在未經教宗批准下，第一次非法祝聖了兩位主教。由此，開始了一系列嚴重傷害教會共融的行為。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在全中國掀起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席捲了中國公教團體。那些相對較為接受政府當局強加的新指示的主教、司鐸和平信徒，也未能幸免。

八十年代，隨著鄧小平推行的開放政策，開啓了一段宗教寬容的時期，出現了一些活動和對話的可能。聖堂、修道院和修會會院重新開放；團體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從中國教會團體傳來的消息證實，殉道者們的鮮血再次成為孕育新基督信徒的種子——這一團體的信德始終保持著生命力、絕大部分天主教友都作出了忠實于基督、忠實于教會的英勇見證。教友的家庭，成了他們中間信仰傳承的關鍵。但是，新的氛圍也在公教團體內部激起了不同的反響。

爲此，教宗談到了一些牧人們，“有些主教因不願屈從對教會生活的不當控制，且爲了完全忠于天主教的道理和伯多祿的繼承人，被迫秘密地接受了祝聖”，以確保爲自己的團體提供牧靈服務（第八號）。教宗明確指出，事實上，“秘密狀態”“並非屬於教會生活的常規。歷史告訴我們，只有當迫切渴望維護自身信仰的完整性、不接受國家機構干涉教會切身生活時，牧者和信友們才這樣做”（同上）。

其他主教們，則出于對教友利益的關心、並將目光放遠到未來，“未經教宗授命而接受了祝聖，事後提出要求和伯多祿繼承人及其他主教們完全共融”（同上）。鑒于局勢的複雜性，加之推動重新恢復完全共融的強烈渴望，教宗授予了他們中的許多人“合法身份的全部職權”。

在認真分析中國教會局勢的同時，教宗本篤十六世深知這一團體倍受教友和牧人都捲入的嚴重沖突狀況的煎熬。但是，教宗突出強調指出，這種痛苦狀況並非爲教義問題上的觀點不同所致，而是“那些被貫以天主教會生活主要責任者的機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第七號）所導致的結果。根據這些機構所宣稱的，其宗旨主要是落實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而這些，與天主教會的道理是不相容的。

此類干涉，才使局勢真正令人擔憂。而且，主教和司鐸們在履行各自的牧靈職責時都倍受控制和約束。

九十年代，越來越多的各地主教及司鐸不斷要求聖座萬民福音傳播部和聖座國務院，對如何處理中國教會生活中的一些問題作出明確的指示。許多人都在問，對政府和強加于教會生活中的國家組織機構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也有人提出了與聖事密切相關的問題，是否可以同那些未經教會批准而祝聖的主教共祭、或從上述主教祝聖的司鐸手中領受聖事等。而中國天主教團體中的某些部分，始終對數目越來越多的主教的非法祝聖感到不知所措*（見勘誤表）。

此外，宗教活動場所登記的法規，以及國家要證明參加愛國會身份的要求，引發了新的緊張狀態和更多的疑問。

那些年裏，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多次向中國的教會發表了文告、呼籲，邀請全體天主教徒合一、修和。教宗的講話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激發了信衆對合一的渴望。但是，很遺憾，與當局的緊張關係、公教團體內的緊張狀況並未能緩解。

就聖座而言，先後對各種問題作出了指示和回覆。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新出現的越來越複雜的情況，迫切需要針對整個問題作出新的審視，從而對各種要求提供一個更加明確的回答、使人們了解切實可靠的未來牧靈活動的指導。

B - 本函的完成過程

一個由中國問題專家、羅馬教廷負責中國天主教會事務的神長們所組成的、十分精簡的專門委員會，全面地、細緻地分析闡述了各種似乎最能突出反應近年來中國教會生活的問題。當教宗本篤十六世決定于二〇〇七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召集包括一些中國教會神長們參加的會議後，上面提到的委員會便開始著手籌備一份文件，旨在推動就各種問題進行的廣泛討論、從與會者處收集實用的說明指教，從而為中國的公教團體提出一些可能的神學-牧靈學指導。親臨最後一次會議的教宗，在作出其他指示的同時，決定親自致函中國的主教、司鐸、度獻身生活者和平信徒。

C - 本函的內容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致函中國天主教徒時寫道，“這封信無意涉及你們所熟知的複雜問題的具體方面，旨在就中國教會生活和福傳事業提出一些指導”。幫助中國天主教徒“發現上主、導師——人類歷史的‘鎖鑰、中心和終向’——耶穌基督對你們所要求的”（第二號）。教宗強調了天主教教會學的一些基本原則，旨在對最重要的問題作出指引。並充分認識到，這些原則的光照將幫助中國天主教會團體解決各種問題、為一些具體的方面提供幫助。

教宗在充分表達了對中國教友們在近五十年來所表現出的忠誠的巨大喜悅之際，重申他們為福音所蒙受的苦難、所遭遇的迫害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向所有人發出了合一與修和的強烈呼籲。在深知完全修和“不可能一天完成”的同時，教宗指出，“在和好的路途上有許多‘信仰見證者’的榜樣和祈禱在支持著妳們。他們曾為教會在中國的將來奉獻了他們的生命、受了苦難、作了寬恕”（第六號）。

在此背景下，耶穌的話——“划到深處”（路 5, 4）再次顯得十分有益。這句話，“邀請我們感激過去、熱衷現在、胸懷未來”。事實上，在中國如同世界各地壹樣，“教會亦蒙召作基督的見證；憧憬未來、在宣講福音中考慮到中華民族所要面對的新挑戰”（第三號）。教宗指出，“宣講被釘死又復活了基督也是可能的，只要你們忠于福音，與伯多祿宗徒繼承者和普世教會共融，就會知道將愛與合一的標誌付之行動”（同上）。

針對主教和司鐸們向聖座徵詢的問題中那些最為緊迫的問題，教宗本篤十六世就有關政府當局承認地下團體教會人士（參見第七號）作出了指示，並全面突出了中國主教的職能問題（參見第八號），特別談到了主教的任命（參見第九號）。此外，教宗為團體作出的牧靈指導具有十分特殊的意義。首先，強調了在教會團體中的主教形象和使命——“不可沒有主教 *Nihil Sine Episcopo*”。接著，就共同舉行聖體聖事問題作出了指示；邀請根據教會法典的規定成立教區機構。同時，教宗還對司鐸的培育和家庭生活作出了指示。

關於公教團體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問題，教宗以十分平靜、尊重的語氣指出了梵二大公會議也重申了的天主教會道理。教宗還充分表達了誠摯的祝願，希望聖座與中國政府的對話能夠繼續下去，從而就主教任命達成共識、通過尊重名副其實的宗教自由使天主教徒們完全實踐信仰生活、聖座與北京政府的關係能夠實現正常化。

最後，教宗宣布撤消過去和最近一段時間裏，聖座授予中國教會的一切牧靈職權和指示。中國教會局勢的不斷變化，以及通訊聯絡方面的極大便利（參見第十八號），使中國天主教友們已經能夠遵循教會法典的常規規範。一旦需要，可直接向聖座求助。總之，上述撤消的職權和指示中所闡述的教會道理原則的應用全部按照本函的新指示處理（參見第十八號）。

D - 本函的風格及目的

教宗用那給人以精神啓迪、又語重心長的牧靈口吻，向全體在中國的天主教會講話。教宗的目的，絕非制造與某個人或某個團體之間針鋒相對的局面。即便針對某些關鍵問題予以了突出的表達，教宗在極其明確地指出了神學原則的同時，仍然對特定的具體時間背景、對所涉及的人給予了極大的理解。教宗希望邀請教會更加深入地忠實于耶穌基督；叮囑全體中國天主教友牢記在他們國家具體的現實背景下做福傳者的使命。教宗十分尊重和敬重偉大的中國人民的古老歷史及近代歷史；在深知中國教會生活正常化要求與政府當局展開坦誠、開放、建設性對話的同時，再次重申，願意同中國當局展開對話。教宗本篤十六世與他的前任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樣，都堅定不移地相信，這一正常化將為世界和平作出無可比擬的巨大貢獻。由此，為各族人民和睦相處的偉大畫卷創造一幅不可替代的珍貴篇章。

勘誤表

《注解》中 A 標題第九段最後一行“而中國天主教團體中的某些部分，始終對數目越來越多的主教的非法祝聖感到不知所措”，改為“面對相當數量的非法祝聖主教的合法化，他們感到迷茫”。